
民俗艺术的现代性遭遇

——以苏州胜浦宣卷为例

朱冠楠 杨旺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苏州胜浦宣卷的变迁过程，揭示现代化、城市化对类似胜浦宣卷这样民俗艺术带来的两面性影响，即遭遇传统破坏又经历现代发展，并不仅仅表现为消极的负面影响，而且同时带来了积极的正面的推进作用。一方面，现代化、城市化带来了胜浦人生活空间的剧烈变化，侵蚀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场域；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实践使曾经不受重视、甚至被贬低的胜浦宣卷这一草根民俗文化得到了承认。非遗保护对民俗艺术的“唤起作用”推进了胜浦宣卷文化认同之自觉性的生发，促进其从谋生手段向艺术传承的目的转换。

【关键词】胜浦宣卷 民俗艺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艺术是一种依附于文化“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而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要求一种普遍性知识，现代性逻辑的展开必然不断碾压着各种“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价值观。因而，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民俗艺术及其所依附的文化“小传统”，在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走向没落、消失似乎是一种注定的命运。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现代化进程比中西部地区要早，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地区最先进行了城市化建设，原来的乡村都变成了城镇，民俗艺术失去了依附的空间，民俗艺术遭遇破坏较为严重。然而，我们调研发现，东南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觉醒和保护意识，他们比其他地区更早认识到保护本土文化的重要性。而且，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长期被贬低的草根文化被重新赋予了积极的价值。苏州胜浦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本文拟就苏州胜浦宣卷为例，探讨经济发达的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俗艺术的命运、遭遇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胜浦宣卷的基本概况和变迁过程

胜浦处于苏州城区最东部，是一个传统的江南水乡，具有十分浓郁的南方水乡特色，并保留了较好的文化传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着“胜浦三宝”之称的当地世代传承的宣卷、水乡妇女服饰和山歌。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胜浦地区村落稠密，无集

作者简介：

朱冠楠，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讲师 210095

杨旺生，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10095

本文为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面上项目“城市化背景下苏州胜浦‘非遗’保护的文化功能研究”（项目编号：SK2016027）阶段性成果。

镇。1994 年，胜浦撤乡建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此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胜浦行政村全部撤销，撤镇建街道，建立了八个现代城市社区，即市镇、金苑、园东、吴淞、新盛花园、浪花苑、闻涛苑、滨江苑。二十余年的城市化大开发、大动迁，使胜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几十年前的传统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集人居、工业、商贸于一体的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格局”^[1]。可见，胜浦的城市化过程非常具有典型性。在胜浦农民变成现代市民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抛弃原来固有的民俗艺术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以考察苏州胜浦宣卷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1. 胜浦宣卷的基本概况^[2]

胜浦宣卷几百年来在江南乡村盛行不衰，由于它的民俗性、传统性被乡民接受并流传，成为乡村喜庆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娱乐活动^[3]。可以说，千年沿袭、至今不衰的胜浦宣卷不仅是苏州宣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州宣卷的主要代表之一。凡在乡村里的一些庙会、教堂等民俗事像和农家婚庆、寿诞、新居、婴儿剃头等礼仪之日都要请来宣卷热闹一番。宣卷本来就是一种道贺喜庆、欢乐场面的娱乐形式，请来宣卷先生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欢聚一堂，可以增加喜庆气氛。另外，宣卷在形式上还能满足事主的信仰，即在宣卷开始时先要“请佛”求诸神诸佛同过俗事，宣卷结束后要把他们“送走”，叫“送佛”，以求祈福禳灾，至今在胜浦相沿成习。

胜浦宣卷有传统宣卷(胜浦人习惯称“双档宣卷”)和丝弦宣卷两种。传统宣卷一般是两人搭档，故称双(人)档。两人在桌子东西两旁相对就坐。东首的称“上手”，面前桌子上放着醒木、折扇、经盖和木鱼等道具。宣卷先生翻开卷本(即宣卷脚本，统称宣卷)置于桌子上，照本宣讲，时说时唱；西边称作“下手”，一边击打磬子，一边嘴里附和着“上手”每句唱词最后一二个字，并加唱“南无阿弥陀佛”一句禅语于落调，被称为“和调”；丝弦宣卷有 6-7 人，SS 置丝弦乐器。除了木鱼、磬子亦同双(人)宣卷一样，还用其余丝弦乐器配音，增加气氛渲染。

传统胜浦宣卷一般在家内进行，在客堂(厅)北首正中，纵向拼放 2 只八仙桌。坐北朝南。北首墙壁悬挂中堂(做寿挂寿星轴，婚嫁挂和合轴)。中堂下面桌子靠墙列置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南极仙翁、土地神君、阴曹阎王、五路财神、释迦如来、瑶池王母等各方数十尊诸神众佛的画像(俗称纸马)。纸马前桌上供有酒盅、糖果、荤素祭品及礼盒，台前红烛(寿烛或喜烛)高燃，清香(或寿香)袅袅。纸马右侧，还放置一只“万粮斗”。所谓“万粮斗”就是盛一斗白米，在白米中点上一盏菜油灯，插一杆木秤，置一面镜子，以求祈福禳灾。

宣卷开始，首先是“请佛”，宣卷者手持清香，站在桌前颂唱“三宝科仪”，恭请诸佛降临。请佛时，宣卷者时而面北，时而朝南。如唱到“奉请南洋观世音”时，面朝南躬身。接下来唱到“善才龙女降台临”时，面朝北躬身。还有“奉请释迦如来佛，五百罗汉降台临；奉请瑶池王母尊，九天仙女降台临”等等。“上请上界诸佛祖，中请中央五岳神，下请龙宫并水府，上中下三界各降临”一共 32 尊神与佛。请佛需花二十分钟时间，然后开始正式宣卷，宣卷者携带数十本宣卷脚本。一般让听众“点卷”，点什么卷就宣什么卷。听众不点，由宣卷者自己决定任选一本。宣卷时，将脚本摊在面前，照本宣唱。中间有落会，稍作休息。事家请客吃夜宵，一般是吃长寿面。卷本内容多数是民间传统，历史故事，用本乡方言宣唱，突出本土传统文化，体现本地民俗风情。故事内容一般是劝人为善，祈求国泰民安。村中庙会、农家婚丧喜事都要请宣卷班子演出，以宣卷会友，亲

[1] 胜浦镇人民政府：《苏州市工业园区胜浦镇创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乡镇工作自评报告》，2008 年 9 月。

[2] 参见马颢伯：《浅说胜浦宣卷的兴衰和现状》，《中国宝卷生态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86 页。

[3] 马颢伯：《走访胜浦宣卷》，《苏州杂志》2010 年第 4 期。

邻之间形成和睦友善的氛围,即使有些嫌隙,届时也会到宣卷堂前一起烧香、叩头,显示了乡人的宽容。

2. 胜浦宣卷的变迁过程

胜浦宣卷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变文。宣卷研究者郑振铎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中提出:“宝卷是唐代变文的嫡系子孙。”^[1]史琳在考察胜浦宣卷时发现:“不论是表演形式还是表演内容,苏州胜浦宣卷与唐代的变文基本一致。”^[2]“南宋时期,部分‘变文’演化为‘宝卷’,奉佛弟子的‘宣唱’从‘说经文’中脱胎而出,成为中国一支独立的曲艺品种——宣卷;元代,宣卷在江南获得了长足发展;明清时期,宣卷达到了鼎盛。……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宣卷’逐渐兴盛,与江南吴语弹词并列为两大民间说唱曲艺。”^[3]胜浦宣卷也由此在元明时期,以讲经的形式普及到农村,并于清初发展到顶峰。

“入清以后,清政府把所有民间宗教视为‘邪教’而严厉镇压,宣卷受到很大冲击,北方除个别地区外,宣卷几乎消失,只在民间宗教传教活动中仍保留宣卷,它们多处于秘密状态。而在江南吴语区,宣卷虽然在个别地区也遭到政府禁止,但整体上远不及北方严厉。由于历史文化的因素,宣卷已成为一种民间讲唱艺术而被保留下来,康熙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它已完全脱离了民间宗教和佛教的僧尼,而由‘宣卷先生’、‘佛头’演唱。这些宣卷先生或佛头具有民间迷信职业者和民间艺人的双重身份,其流行区域遍及整个吴语区,而尤以苏州、无锡及后来的上海等地为普及。在苏州郊区农村,更保留了明代宣卷原始形式的‘讲经’各地宣卷活动虽仍与民间信仰和迷信活动结合在一起,但已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曲艺形式,用各地方言演唱传统故事宝卷中以‘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意识被删除,同时大量弹词和戏曲故事、民间传说故事被改编成宝卷进行演唱。”^[4]

到了民国时期,胜浦宣卷已经用娱乐的形式来“劝人为善”,但依然遵循着明代时法会前“赞、经、褐、咒”的一套禅门功课,一一地唱罢、念罢、诵罢,宣卷才进入“正本”。这时胜浦涌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宣卷先生,有方前村的刘秀甫、三家村的何甸圃、赵巷村的周瑞文、前戴村的胡舟散、西港田的杨若卿和周荣藻等。他们有的子承父业,有的跟师学艺各自组成宣卷班子,几乎一生从事宣卷活动^[5]。

新中国成立后,胜浦宣卷仍是当地的一种民间主要娱乐形式,不论是公祭庙会,还是百姓喜庆,都离不开宣卷。宣卷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百姓对未来生活富贵安康的一种期望和寄托。时势造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又孵出一批宣卷艺人。特别一些旧时的私塾先生也干起了宣卷这一行当。解放初期活跃在胜浦地区的宣卷艺人有方前村的刘秀夫、三家村的何甸圃、前戴村的沈和生、赵巷村的周秀火、南巷村的唐铁群、刁巷村的徐文奎和夏文禹等。他们读过四书五经,也乐意传承宣卷这行当。他们不但被乡民经常请到家中进行宣卷,还认真整理宣卷脚本(即“宝卷”),潜心抄写一本本古旧的宝卷,得以使一些宝卷留存至今。到了“文革”期间,宣卷被视为封建迷信,作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一些从事宣卷的艺人也纷纷改行,有的为大集体养猪,有的改行做其他手艺。^[1]

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重提弘扬和继承传统文化,胜浦宣卷才得以重新恢复并获得较快发展。这时的丝弦宣卷内容增加了传统戏曲剧目,如《双推磨》、《拔兰花》及《赠塔》、《庵堂相会》等戏曲片段,曲调也较繁杂,有锡剧、沪剧等

[1]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

[2][3][4]史琳:《苏州胜浦宣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第8、13页,第12-13页。

[5] 马颀伯:《走访胜浦宣卷》,《苏州杂志》2010年第4期。

地方曲调，还有《四季调》、《五更调》等民间小曲。整个演出以表演为主，气氛活跃，喜庆吉祥，深受百姓喜爱。除了老一代民间艺人重操旧业外，南巷村的归金宗、前戴村的顾传金、江圩村的花俊德、西巷村的周祥男等年轻一代的宣卷艺人也纷纷活跃在民间宣卷舞台。到了 21 世纪，胜浦民间已经拥有两百多本宝卷，这些宝卷作为传统的宣卷文本，在民间流传。目前，胜浦有七、八个宣卷班子，与周边乡镇相比较，是宣卷班子最多、人员最活跃、名气最响的。同时，宣卷在现代生活中仍沿袭着许多固有形式，那些遗存至今的传统程序、祭祀仪式、民间观赏习惯等诸多传统特征，还被广大居民所接受。

二、现代社会发展影响下的胜浦宣卷

考察苏州胜浦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现代化、城市化的社会发展对胜浦宣卷的传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城市化的社会变迁带来了胜浦人生活空间的剧烈变化，侵蚀了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场域，原先分散的 26 个自然村落，已迅速转型为 8 个聚集的现代城市社区。胜浦人生活空间的转型重构带来从物质生活到文化需要各方面的巨变，当代城市文化侵蚀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传统生活场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证明不断扩张的进化式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片面的城市化正在导致农村文化的衰败，也使整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日趋严重。”^[2]

都市文化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主导文化形态对于立足传统农耕文化的胜浦宣卷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冲击，胜浦宣卷这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传统民俗文化正在被都市文化、商业文化这类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所取代。据当地对宣卷颇有研究的马觐伯先生(原胜浦文化站站长)口述，“目前胜浦宣卷大多是老年人听，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知道宣卷，也不会去听，年轻人生活在流行歌曲的时代，他们接受现代文化的教育，用现代的方式过现代的生活。内容决定了宣卷的生命力，宣卷的内容(00本)表达了劝人为善的思想，如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等，老人看到这种内容就很喜欢。而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比较现实，很多会以实用或自我为中心，对宣卷内容不太感兴趣。毛泽东时代宣传英雄主义，团结就是力量，而现在的人都只想着保护自己。这或许也是教育的一种失败吧!”^[3]宣卷先生顾传金也说：“宣卷前途不容乐观，现在传承的人都是 60 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去了，下一代恐怕后继无人！如年轻人不太喜欢宣卷，学习的人根本没有，所以，传承成了一个大问题，这需要政府扶持、支持，否则会自生自灭。如果不把宣卷保护和传承好，将会对不起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不起老祖宗！”^[4]

胜浦宣卷面临的文化冲突和传承危机实际上是乡土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的文化困境。21 世纪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正是对这种全球性文化危机的应对。我国自 2004 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宣传和实践力度不断增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与实践使曾经不受重视，甚至被贬低的胜浦宣卷这一草根民俗文化得到了承认。不仅是胜浦宣卷艺人，越来越多的胜浦人也开始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宣卷。

社会空间的变迁，使胜浦宣卷这种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发生了继替与延伸，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空间逐渐从单一稳定向着复杂多元的方向转变。在传统胜浦社会，乡村里的一些庙会、教堂等民俗事像和农家婚庆、寿诞、新居、婴儿剃头等礼仪之日都要请宣卷先生与亲朋好友、邻里乡亲欢聚一堂，增加喜庆气氛。在现代胜浦社会，宣卷先生除了会偶尔被一些年纪较大的

[1] 参见马觐伯：《浅说胜浦宣卷的兴衰和现状》，《中国宝卷生态化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86 页。

[2] 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西安）《人文杂志》2010 年第 5 期。

[3] 马觐伯：胜浦当地著名文化精英，笔者于 2015 年 12 月 20 日访问。

[4] 顾传金：胜浦当代宣卷先生，史琳女士于 2009 年 11 月 6 日访问。

居民请到自己家中进行宣讲之外，更多的是经常被街道社区或民间组织等邀请表演。据笔者近几年的跟踪调查得知，胜浦街道安排胜浦宣卷 2016 年以来每周三次分别在 3 个社区进行表演，街道负责人对笔者说这样安排的原因是目前仍有固定的群体喜欢听宣卷，但由于他们居住在不同的社区，而各个社区都相隔一定距离，不便于宣讲。为满足他们的需求，丰富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胜浦街道在 8 个社区中挑选了 3 个地理位置相对交通便利的社区，成立了宣卷馆和宣卷大讲堂，定期组织宣卷表演活动。笔者近一年曾六次去过这三个社区的宣卷活动现场，发现安排在社区大会议室的宣卷活动每场都是座无虚席，观众们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会身着传统江南水乡服饰，从各自住处按时赶来观赏宣卷表演。不仅如此，因胜浦划归苏州工业园区，园区一些公司或宣卷民间爱好者定期组织或举办一些传统活动时，也会邀请宣卷班子前去演出。近年来，随着胜浦宣卷名气的增大，胜浦的宣卷班子还应邀经常参加全国各地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类的民俗文化活动，比如，在 2011 年 11 月 21 日-22 日的第二届江浙沪宣卷演唱交流会表演上，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文体站选派的宣卷先生归金宗、和佛、沈雪娥等六名民间艺人，代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胜浦宣卷”参加了此次交流会，并获得优秀展示奖。

2011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开始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个完全融入中国当下的正式国家体制的概念^[1]。非遗保护的出发点是“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2]。从这个观念出发，再考虑到此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就可明白，非遗保护的是文化多样性，包括不同社区，尤其是原住民、群体乃至个人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胜浦宣卷具有文化独特性和江南乡土社会“小传统”的重要特征，继 2009 年入选江苏省省级非遗名录项目之后，2014 年又成功入选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民俗研究的延伸，胜浦宣卷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已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笔者调查得知，苏州政府已将胜浦宣卷作为苏州的一个文化品牌进行宣传，不断加大对胜浦宣卷传承保护工作力度。目前，当地政府在吴淞社区建立了“胜浦三宝馆”，其中陈列的栩栩如生的胜浦宣卷堂，可供各地游客参观学习，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多了解这一优秀的传统民俗艺术。据笔者对胜浦 8 个社区中 220 人（2 份问卷无效）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一周听一次宣卷的有 31 人，占 15.42%；一个月听一次宣卷的有 24 人，占 11.94%；偶尔听宣卷的有 55 人，占 27.36%；不听宣卷的有 108 人，占 53.73%。由此可知，目前听过胜浦宣卷的人已达到近一半。在进一步的访谈中我们还得知，当地不少中青年（包括外来务工人员）是在社区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宣传活动中了解胜浦宣卷的，他们中多数人表示以往对胜浦宣卷不太清楚，现在知道并了解是因为胜浦宣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认为应当对其予以保护传承。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曾经不受重视，甚至被贬低的胜浦宣卷这一草根民俗文化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不仅是胜浦宣卷艺人，越来越多的胜浦人也开始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宣卷。

三、非遗保护对民俗艺术的“唤起作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意义是保护乡土文化的活态传承，即保护一个文化群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凝聚和代代传承的集体记忆、情感认同和精神需要，并使之保持生命力和创造性。如胜浦宣卷这类的民俗文化事项在现代化进程中曾被当作迷信、粗鄙、浅陋的“草根文化”而鄙视甚至打压。但在简单地否定和打压民间文化传统之后，民众的集体记忆和乡土认同需要被消除或压抑，造成了普遍的身份失落危机。“中国已经是一个以科学技术为名、习惯用对与错检验的现代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从积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已经比较现代的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这是一种充满认同焦虑的社会。占主体的现代文化是

[1] 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广州）《开放时代》2013 年第 5 期。

[2] 李松：《原生态一概念背后的文化诉求》，（北京）《光明日报》，2006 年 7 月 7 日。

通用文化，不能够成为国民自我认同的对象。恰恰要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在民众生活中寻找文化认同对象的途径才一下子顺畅起来。”^[1]

从被清除的“四旧”转换为具有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观念的转换，也需要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创新。胜浦宣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操作中采用重新命名的技巧，让原来在社会中不受重视、甚至受封建迷信等负面价值影响的“草根文化”——胜浦宣卷经过选择程序之后重新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下，成为了具有极高价值的民俗文化艺术，并成为法定的保护对象，财政资助的对象。我们的民俗艺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已经从负面转化为正面，形成了一个从地方到国家的建立文化认同的路径。这种“唤起作用”推进胜浦宣卷文化认同之自觉性的生发，实现了由以往的谋生手段向艺术传承的目的转换。

尽管现代都市文化不断冲击传统文化，但胜浦宣卷传统民俗文化仍然有其生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所接受。随着“非遗”保护实践的推进和保护理念的传播深化，这种草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获得了支持，增加了活力。今年 72 岁的花俊德是现在被媒体较多关注，受当地居民欢迎的一位宣卷艺人^[2]。花先生告诉笔者，他现在的宣卷表演已经不再是十几、二十年以前的生计需要，更多时候都是为了配合政府和社区对胜浦宣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及宣卷保护传承工作，他说他偶尔还会根据表演需要将宣卷改成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进行宣讲，如宣传禁毒、社区邻里关系等，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值得引起研究者关注的是，对他们来说，现在胜浦宣卷才作为一种“民俗艺术”真正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宣讲宣卷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了艺术传承；他们的身份也从普通村民转变成了民间艺人。

目前，新一代的宣卷艺人最大的已经 70 多岁，年轻的也要 40 余岁，面对老艺人先后辞世，不少学者对胜浦宣卷的生存情况充满了忧虑。但是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深切的体会到：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胜浦宣卷民俗艺术的这种“唤起作用”，也可能会“唤起”那些曾经不被看好、不了解宣卷的 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的年轻一代，“唤起”他们对胜浦宣卷等传统民俗文化认同之自觉性的生发，让他们对汉族传统民俗艺术产生越来越强烈的认同感和信心，进而产生自主的“文化自觉”。这样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重建当前的文化生态，宣卷等民俗艺术后继乏人的状况必将会随之得以改善。

张士闪在研究乡村艺术的时候指出：“在当代社会这一不可更改的大背景下，乡民艺术往往有两个走向：一、衰亡；二、以改装甚至伪化求取生存。”^[3]如果以胜浦宣卷为个案来说，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类的走向：传统民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的结合。笔者认为，不管走向如何，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对类似胜浦宣卷这样民俗艺术带来的两面性影响与冲击时，我们应该思考，而不应该悲观。正如萨林斯所说：“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重现出来。”^[4]面对和其他国家同样要经历的社会发展问题，如何从历史的进程进行思考并做出正面的回应，如何通过非物质

[1] 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广州）《开放时代》2013 年第 5 期。

[2] 作为目前胜浦民间拥护最高，但还没有正式批文的一位胜浦宣卷传承人，花俊德可以说是目前胜浦镇宣卷唱的最好的主唱者之一，不仅胜浦街道举办各种活动请他的团队表演最多，苏州周边地区以及上海、浙江等地也经常请他去唱宣卷，在当地名声颇大。

[3] 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4 页。

[4] （美）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41 页。

文化遗产保护来重建中国的文化生态，使曾经一定程度上“失衡”的文化生态得到修复，是我们今后的民俗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英)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张亚辉、鲍雯妍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
2. (美) 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3.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4. 黄靖：《宝卷民俗》，（苏州）吴轩出版社 2013 年版。
5. 高小康：《都市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6. 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上海生活书店 1934 年版。
7. 史琳：《苏州胜浦宣卷》，（苏州）吴轩出版社 2010 年版。
8. 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9. (美)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10. 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广州）《开放时代》2013 年第 5 期。
11. 李乾夫：《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自觉与保护》，《大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1 期。
12. 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文化复兴》，（西安）《人文杂志》2010 年第 5 期。
13. 马颢伯：《浅说胜浦宣卷的兴衰和现状》，《中国宝卷生态化保护与传承交流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4-86 页。
14. 马颢伯：《走访胜浦宣卷》，《苏州杂志》2010 年第 4 期。